



《危险关系——母亲与女儿的相处之谜》
[日] 斋藤环 著 高璐璐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别扭的母女

□张怡微

去年读了一本谈母女关系的书，是日本精神分析学家斋藤环与五位女性名人（田房永子、角田光代、萩尾望都、信田小夜子、水无田气流）关于“母女关系”话题的对谈集，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热爱文学的读者，随口就能举出不少当代作品中典型的中国母女关系，例如张爱玲的《金锁记》、王安忆的《长恨歌》、苏童的《妇女生活》，等等。在我们专栏中谈过的更年轻一代的作家作品中，新型的母女关系书写也不胜枚举。例如金惠珍的《关于女儿》、金草叶的《馆内失踪》、金爱烂的《刀痕》、娜塔莎·沃丁的《她来自马里乌波尔》，等等。如果没有阅读这本《危险关系——母亲与女儿的相处之谜》，我差点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所举出的文学范例中，母女关系大多是消极和紧张的，而不是纯爱的、无暇的、温馨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漫画家田房永子谈到了母爱与控制的关系，强势的母亲期待在女儿身上找回掌控的感觉。尤其是她谈到对于发型的规范，让我想到许鞍华的电影《客途秋恨》，母亲觉得母女不烫一个发型就不像一家人，女儿认为就算烫成一个发型又怎样，母女根本不会有一条心。和母亲的斗争与告别，意味着痛苦的成人仪式，田房永子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不能用好坏来定义，而是只能用“搁置”来描述。斋藤点出了一个关键：“在有问题的母女关系里，男性的偷懒往往是终极怪兽……母亲被迫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认为女儿是她活着的唯一动力，多半是由于丈夫在夫妻关系的维系中做了逃兵。”渴望父亲援助的田房回答说：“刚开始他两边都不得罪，后来还是站在了母亲那一边，而不是我。”田房埋怨父亲的决策和“偷懒”的指控有点意思，但对这个问题谈得更深更幽微的，还是作家角田光代的发现。角田光代提到一位名叫山本文子的美食博主谈及的逸闻，说自己有一次参加女儿小学的家委会，老师对家长们说：“请大家轮流说出自己喜欢孩子的地方。”然后所有男孩子的母亲说的都是肯定回答，比如“我喜欢孩子的全部”“我没有讨厌孩子的地方”，女孩子的母亲会说一些女儿的缺点再补充“但我还是很喜欢她”。这和我们曾经读过的亲子教育教科书完全不同，我们总说父亲的爱是有条件的，母亲的爱是无私的。我们没有调换视角来重新研判，原来母亲对儿子的爱是可以“更”无条件的，母亲对女儿的爱是“虽然……但我还是很喜欢她”。

我读到这本书的样稿时，书名的副标题还是“别扭的母女”，出版时不知为何被修正为更正面的“母亲与女儿的相处之谜”。修正的依据也来自于角田光代的部分，他们谈话的共识是认为母女关系至今没能成为普遍问题，是因为谜点太多。和母女关系比起来，母子关系里没有那么多谜一般因素，是结构相对简单的构成，母女关系则是复杂的。日本研究者会如此关切心理学或者说精神分析视角下的母女问题，本质上带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学背景。在讨论“关系”的时候，先要讨论性别，讨论性别的前提，是讨论身体和知觉的构成。因而这本小书的意图，可能不只是在研究病理、情感或极端个案中展现的代际冲突，甚至也不是文学性的关照。斋藤环开启这个话题的前提，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就不得不意识到自己的具身性，女性和男性对身体和病体的自觉并不相同，所以母子问题和母女问题并不相同。我原本对此论述颇不以为意。直至前几天我去一个播客节目录制有关妇女节的话题，对谈嘉宾是做女性辅助生殖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她的田野成果突然令我醒悟。

那位研究者和全国各地涌入北京医院做试管婴儿的女性们一起租住在“家庭旅馆”中。她在田野中有趣的发现之一，是她觉得自己是一种“病人”，因为她们和全国各地疑难杂症的病人都租住在医院旁边，尽管她们是健康的。她们只是有生育的欲望，需要得到科技的帮助，但她们被某种治疗的氛围浸润着，告诉自己，怀上孩子的那一刻，就意味着“病”治好了。而男性就非常简单，出于自尊，他们一般不会承认自己在生育方面有病，更不要说自我命名式的“治疗”和“治愈”。

如果我们对母女问题复杂性的理解，仅仅停留于同性“性魅力”的竞争，那便也是一种狭隘的简化。正如角田光代所说，“虽说母亲如何对待我（例如不给全盘肯定）不会百分之百影响到我人生的前进步伐，但相当程度上还是有关联，比父亲的影响要大得多。”这让我想起演员周迅谈到希望母亲对自己说的话，是“其实你也可以不结婚”。但母亲就是不说。不说就不说，对她也不会有百分之百的影响。尽管母亲说这样的话，就是会比父亲说要有力量。我可以感受到这种差异，但我也不知道原因，确如一个谜。



《“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
黄兴涛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词”

□陆远

2010年初，美国方言学会曾举办过一次“世纪之词”的评选。人们熟悉的“自由”“正义”“自然”“OK”“书”等词汇都获得提名。杀入决赛的两个词，最终“她”以35票对27票的成绩，战胜了“科学”，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一个词”。

“她”字入选“世纪之词”，意味深长。这个结果与人类学家海伦·费希的观点不谋而合，她认为，女人将是21世纪的“第一性”。人们也许忘记了，“她”，曾经是一个多么微不足道的字眼，在中世纪之前，英文字典里甚至都没有“她”（she）这个字。而在东方，专门用以表示女性第三人称单数的代词出现得更晚。

根据学者黄兴涛的考证，最早面对女性代词困境的，是在中国生活的老外。第一个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编辑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英华字典》的时候，就很为一件事挠头：英语中的he/she/it，在汉语中都用“他”来指代，无法区分。无奈之下，马礼逊自己用了个笨办法，他把he/she/it分别翻译成“他男”“他女”“他物”，今天看起来颇为滑稽，却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流窘境的真实写照。

不过，汉语里虽然没有现成的语词与之对应，却并不等于就无计可施。差不多半个世纪后，一个叫郭赞生的中国人迈出了具有创造性的一步，明确地把he/she/it分别翻译成“他”“伊”“彼”。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里，用“伊”指代女性，成为一种文艺的语言方式，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可以在那种文雅的小说散文里，看到这个词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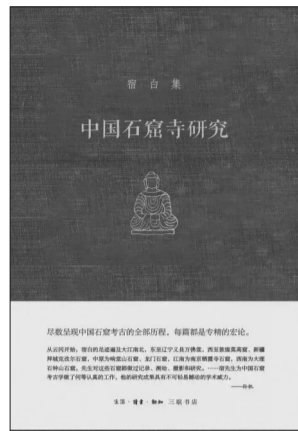
20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新文化运动逐渐兴起，正是那批擎起“新文化”大旗的知识人刘半农、周作人、叶圣陶、钱玄同、康白情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从男女平等的角度，开始关注这个女性指代单词的问题。1919年5月20日，24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康白情在《晨报》上发表题为《北京学生界男女交际之先声》的文章，率先正式使用了“她”作为女性代名词，其思想背景和直接契机，则是五四时期“男女同校”和“男女正当交际”的呼声正在各大城市蓬勃兴起。那以后，“她”五四时期中国人发明的“最迷人的新语词之一”，逐渐成为文学史上美好的意向，尤其受到诗人的宠爱。最著名的当然是刘半农先生的名作《教我如何不想她》（初题为《情歌》）。在温柔甜蜜的反面，也有声泪俱下的控诉，比如1920年诗人金德章发表的《她么》：“她么？/她嫁了么？/她的夫是一个残暴的野兽么？/她是二十世纪的新人物，情愿牺牲她毕生的幸福么？/她也是完全的一个女人，谁敢夺她的自主权？……”对处于新旧之间的中国女性婚姻不自由的悲惨际遇给予同情和关切。

20世纪20年代以后，“她”字逐渐成为汉语常用词汇的潮流已不可阻挡，但反对之声却始终不绝于耳，有意思的是，“反对派”却来自彼此大相径庭的两类人。一类是恪守民族文化本位的学者，比如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公开表示反对“她”字的正式通用，认为西方语言的语法各不相同，不尽完美，中国人实在没有盲目仿效的必要。终其一生，陈寅恪始终用“伊”指代女性。另外一类则是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在他/她们看来，专门用一个字来指代女性，恰恰是不将女性和男性同等对待的表现。有人这样写道：“我们不是主张不分男女界线的吗？记得以前还有人批评女子不要称女士，现在用这‘她’字，不是异曲同工么？照这样分别起来，那么凡有关于女性代名词，都应该加一女字偏旁才行，这也算是新文化吗？是应当提倡的吗？”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她”的故事似乎又迎来另一重转折。据说撒切尔夫人任英国当政时，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女孩问男孩：“你长大后还想做什么？”男孩说：“当首相。”女孩很吃惊：“男人也能当首相吗？”这当然是个笑话，却也未尝不是一种隐喻。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全世界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就说过：如果说过去典型的产业工人是一位男性，那么今天典型的信息工作者则是一位女人。

“她”字入选“世纪之词”，似乎意味深长。在21世纪到来之际，女性不再是两性中无足轻重的一方。社会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点。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竞争者比拼的不再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体力，而更多地表现为策划、推广、沟通、联络、互动、服务、协调……而女性特有的敏感、细腻、灵活、韧性、关爱、注意力以及第六感觉等优势，因此得以大显身手。有人戏谑，“历史”的英文单词是“HISTORY”，即“他(HIS)的故事(STORY)”，也就是说，历史是由男人创造的。然而，在业已到来的21世纪，女人将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将要改变“历史”的写法。

删人快语



《中国石窟寺研究》
宿白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

□蒯乐昊

宿白，考古学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考古学、佛教考古、建筑考古以及古籍版本乃至金石篆刻等诸多领域都卓有建树。2016年获得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时，宿白先生已经94岁高龄，两年后，他在北京辞世。

据说宿白老先生早年随徐悲鸿学画，所有他带过的学生，都记得他在课堂上吓人的作画能力，为了给学生讲解古代建筑，他可以马上在黑板上画出该建筑的正视图、侧视图以及俯视图，下笔毫不犹豫，复杂的建筑图形，似乎可以在他脑中自行分解。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极严，每节课都结得实如压缩饼干一般，满满干货，学生要全程奋笔疾书才能追上知识点，尤其是老师开始作画，更要马不停蹄模仿，才能记录下重要建筑的结构要素。

在宿白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中，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种杰出的图形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对于一个有志于田野考古的学者来说是多么重要。云冈石窟密密麻麻的佛龛、漫天神佛，宿白先生迅捷白描，留下了充分而详实的一手图形记录资料。

作为新中国的考古先驱，早在建国之初宿白先生便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当时历史考古学尚处草创时期，考古学家撰写发掘报告，只限于对墓葬形制、出土遗物进行记录，但宿白文献功底深厚，除了记录现象，更能借物以追索，对墓葬所代表的社会历史时期进行了大量还原。

对于考古学界来说，白沙宋墓，不只是一次发掘，更为中国考古事业形成了一套打样式的方法论范式：如何确定墓葬年代、墓主人地位、如何从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等习俗，再现当时宋人的社会图景。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次考古，都不是一个单点，它折射的都是社会的某个切面，并携带着大量可以纵横交错、互相印证的信息，在验证我们已知的历史世界的同时，也弥补着我们未知历史世界的空白。发表近70年，《白沙宋墓》至今依然没有过时。

宿白与云冈的缘分更为奇妙，学生时代，宿白便去过云冈，用惊叹的眼光凝视过那里的大佛，那个时候他不会想到，未来自己竟然会成为“云冈学”在中国的奠基人。1947年，已经成为北京大学考古系首任系主任的宿白，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的时候，无意中从《永乐大典》的残本《顺天府志》中，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该碑撰于金代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原碑实物早已杳无踪迹。通读碑文后，他马上意识到，这篇文章中写到的西周武州山，就是他曾经仁足凝视的云冈。

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尚不为人知的文献。宿白从这篇文献开始，顺藤摸瓜展开了对石窟寺的研究，这也是宿白佛教考古的发轫之作。

在敦煌石窟，留有一尊石刻，上面镌刻着陈寅恪先生的那句：“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因为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和经卷早年散落世界，导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殊不知，学界还流传着类似的一句话：“云冈石窟在中国，云冈研究在日本。”——1938年至1944年，日军占领晋北期间，以日本人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为首的京都大学调查队在云冈石窟先后调查了7次，写出16卷考古学研究报告。可以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里，关于云冈的研究，一直是以日本学者为主导。虽然陈垣、梁思成等中国学者也考察过云冈石窟，但都是局部调研，并未进行系统性研究，直到宿白从碑文中解密了北魏历代开窟建寺的谜团，填补了文献空白，并以此为切入点，多次实地考察，厘清云冈石窟开凿分期的脉络，中国的云冈研究才取得重大突破。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龕之大者，举高二丈余，可受三千许人，面别佛像，穷诸巧丽，龕别异状，骏动人神，栉比相连三十余里。”在今日读宿白先生，亦像是借来他老人家一双巨眼，一眼观古代文献，一眼察眼前遗迹，古今相鉴，在历史和现实中往复穿梭。

也许你要问：这样学术性的专著，考古学的门外汉能看吗？看了又有何益？

有的。因为文明，往往亦是身在此山中便不识其真面目，要看清文明的形状，我们有时候，急需一副带着专业角度的望远镜。

远见近拾

微言达义